

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

本报评论员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任务。我们有一切必要的条件实现这些任务。其中决定性的条件，是党的领导。因此，必须加强新时期的党的建设，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努力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一、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特点及其重要性

党所以能够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责任，成为中国人民求得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核心力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在于它的先进性。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多次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斗争中产生自己的战斗司令部，组成自己的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应当是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的优秀分子的集合，能够以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了解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是在于：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任何时候都强调和坚持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它在领导革命运动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坚持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在这个革命中，由于正确的理论和政策，由于无数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和牺牲精神，党在人民革命事业中确立了领导地位，并把这个革命引导到全面的胜利。历史证明，我们党是中国社会最先进的政治队伍。党的领导作用和战无不胜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先进性。

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以后，接着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建设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对于我们党来说，这种情况带来了两个重大的变化。第一，党过去处于被压迫、被“围剿”的地位，现在则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成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按通常的说法，成为执政的党。第二，过长期时期内，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首先是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接着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现在党的中心任务则是领导人民建设新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这种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特点，对于保持和提高党的先进性提出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和情况，学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各项专业知识，学会领导建

设事业。如果说，党在过去主要是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的话，今天则应当主要是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先锋战士。第二，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应当使每个党员牢记自己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永远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当清醒地掌握这种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永远不忘共产主义的目标，保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纯洁性。

历史证明，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曾经对此作过充分的论证。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与党对经济建设问题和剥削制度消灭以后的阶级斗争与其他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解和处理密切相关。党的八大曾经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但是由于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深，因而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却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问题上越来越发展了“左”的错误，直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这些错误，不能不对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民主生活、党与群众的联系、党的组织纪律和党的作风等等造成严重的损害。从另一方面说，这些错误的发生又是同对于执政党的建设缺乏正确和深刻的认识分不开的。八大虽然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坚持群众路线和反对官僚主义，加强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等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还缺乏足够的深刻的认识，也没有能够在制度和实践中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后来在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制度方面又发生许多错误，个人崇拜现象日益发展，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这种情况又不能不严重地损害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领导，使党不能及时地和彻底地纠正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胜利历史进程表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制定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路线，与加强党的建设也是同时进行、相互促进的。如果不是一方面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改革和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我们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和顺利地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走上正确的道路。

全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系的党的建设，关系到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

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要求

党的十二大不仅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和方针，而且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制度和各项组织原则，提出了加强

赵紫阳会见英国中英贸易协会代表团时说 中国加强同西欧经济关系的方针不会变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会见英国中英贸易协会代表团时说：中国政府重视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发展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

他指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不变，加强同西欧国家经济关系的方针也不会改变。

赵紫阳说，今年，中国的经济情况明显地朝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看来，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可以超过原来的计划。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展开新的建设项目。由此可见，中国同西欧各国在经济技术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我们希望出现同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局面。

在谈到我国西南地区能源开发计划时，赵紫阳说，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在这方面同中国合作。除了煤炭资源的开发外，还可以把开发水电资源和有色金属资源结合起来。

赵紫阳表示，中国和英国可以设法寻找新的合作途径，例如，双方可以合作生产一些设备。

赵紫阳在同代表团团长、中英贸易协会主席纳尔逊勋爵和其他英国客人交谈时对中英贸易协会多年来为发展中英贸易关系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纳尔逊勋爵说，我们希望中英双方共同努力增加两国间的贸易额。他表示，英国的一些企业很有兴趣参与中国西南地区的能源开发、近海石油的开发和计划中的广东地区核电站的兴建。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王耀庭、副主任



赵紫阳同纳尔逊勋爵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我国人脑恶性胶质瘤 体外细胞系培养成功

本报讯 记者朱维群报道：在苏州医学院副院长、归国华侨社子威教授主持下，我国人脑恶性胶质瘤体外细胞系的培养首次获得成功。11月1日江苏省科委在苏州组织的全国有关专家鉴定会上肯定了这一成果。人脑恶性胶质瘤发病率约占各类肿瘤总数的二分之一，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一个大敌。把它的细胞在体外加以培养并使之纯种繁衍，将为选择抗肿瘤药物、开展临床治疗和种基础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

程北的新部二一自的
揭开的航航河百年的
序幕。空空河运的古运
幕。工苏截截

整建流建
了千多
不久将
第一部
自制
的电视
电视。这
是西藏
的电视
电视。

杭运
河

简讯

程北的新部二一自的
揭开的航航河百年的
序幕。空空河运的古运
幕。工苏截截

整建流建
了千多
不久将
第一部
自制
的电视
电视。这
是西藏
的电视
电视。

杭运
河

以实际 行动扩大 共产主义 因素就在 我们身边

广大职工加深了对十二大精神的理解
天津色织三厂开展让共产主义思想在心中扎根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据今天《工人日报》报道：天津市色织三厂布场青年工人陈志强，过去曾经认为“共产主义是大、空、远，摸不着，看不见”。最近，他在一次学习十二大文件座谈会上，却深有感触地说：“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都是共产主义实践者。”这是他积极参加了全厂“当场身边的共产主义因素，让共产主义活动在心灵中扎根”的群众活动之后的思想变化。

这个厂在组织职工学习胡耀邦同志十二大报告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论断时，许多职工感到难于理解，有的说：“共产主义还不知是哪辈子的事呐，怎么会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厂党总支感到，要让大家弄清这个问题，光从理论上讲还不够，必须联系实际生活。于是他们引导职工开展了“宣扬身边的共产主义因素”活动，全体职工运用各种形式大摆自己周围闪烁着共产主义运用火花的的人和事。

布场老工人王维生，每逢节假日后的头一个班次，不论是否该她当班，她都提前进厂，帮助同伴做倒生产“开门红”。二十年来，她以此作为最大乐趣，从未向国家领取过任何报酬。老保金张德元身患重病，住进医院长期治疗。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如何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积累的经验留给青年工人。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以惊人毅力趴在病床上写出了“一本长达14,000多字，包括34幅照片的《好筒机检修手册》”。还有一贯乐于助人、热心公益的张明亮、七个学雷锋小组业余包管七位孤老户的生活琐事，五位青年见义勇为斗歹徒，等等。

据统计，全厂各车间、各部门共宣扬了82件共产主义思想的“闪光点”。

面对这些活生生的大量事实，许多职工的思想豁然开朗了。青年女工孙玉芳说：“是呀，这些同志的行为不是共产主义思想又是什么呢？看来，在我们身边确实每天都在生长着共产主义因素。”这时，厂党总支又因势利导，组织大家反复学习十二大报告的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职工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全厂逐步兴起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扩大共产主义因素的热潮。一个多月来，出现了体现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好事161件；反映社会良好风尚的事86件。

“汽车大王”陈希海被判无期徒刑

参与倒卖汽车案的其他罪犯分别受到法律制裁

新华社郑州11月3日电

河南省安阳市、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阳县人民法院，分别于最近开庭审判，判处“汽车大王”陈希海无期徒刑，参与这一案件的一批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

被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的还有安阳县郊区工委原负责人赵守忠、郊区委员会管工区的原副书记李富林、郊区委员会原书记王树林以及接替王的职务的郊委书记姚光裕。

安阳县人民法院判处高庄公社物资站采购员曹振山有期徒刑三年；判处高庄公社原党委书记周存礼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判处高庄公社原副主任朱金堂有期徒刑一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开庭判处在经济上支持陈希海的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原副行长耿振有有期徒刑三年；判处受陈希海贿赂、参与陈希海倒卖汽车的郑州友谊宾馆原经理陈俊毅有期徒刑三年。

农民的挑战

——河南农村见闻

新华社记者 穆青 周原

我们在扶沟县大李庄公社访问了李成仁和李成怀两弟兄。哥哥李成仁今年交售了4,000斤小麦,政府奖售给他一辆自行车。弟弟李成怀不幸落后,不久后跑到县里,声明他明年要卖1万斤小麦,问政府奖售给什么?

这是个很重要的动向。去年是政府拿奖售物品鼓励农民多卖粮食,今年是农民拿着卖粮数字,问政府能奖售什么?类似李成怀这样的挑战,不是三个两个,而是整批成群的农民。面对着农民的一片呼声,政府该怎么回答呢?县里研究来研究去,手里没有实力,不敢说硬话。后来想尽办法拿出了几条:明年夏季,只要户售万斤粮或人售1,000斤(人产1,500斤)的,就奖售一辆飞鸽自行车、10袋尿素,柴油需要多少就供给多少,但不准替别人买。条件定下来以后,县里同李成怀正式签订了奖售合同。这件事,县里的同志既不敢宣传,更不敢广泛号召。因为每年发给扶沟县的自行车只有400辆(这还是飞鸽牌的,而农民却指名要飞鸽牌的),这么一点东西,怎么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呢?农民对这件事却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没有多久,

类似李成怀的奖售合同,全县已经订了1,300份。其中有290户是售万斤粮的,其余都是以人产1,500斤、人售小麦1,000斤为条件。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谈到抓住农业这一环,带动整个经济形势好转的问题。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正是这种图景。农业兴旺,给各业带来的推动力,常常出乎意料。前几年农民还是站在工业的大门口,等着他们开门;这次在农村看到的,农民已经在叩门了,而且叩门声越来越急。农民对买日用工业品的困难,似乎还能忍受,对买生产资料难,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开封地区农民为买磷肥,几千人围着公社不走。运化肥的车辆被农民拦在,农民付了化肥,留下的价款竟一分不少。现在农村里小机器多得,柴油供应十分紧张,农民提着油桶拦路告状,同坐车的干部管不管柴油,或过路的车辆有没有多余的柴油。

农民的挑战,不仅表现为买着难,更重要的是卖着难。农民对“卖粮难”、“卖油难”、“卖烟难”、“卖棉难”,简直是愤怒。9月下旬还没有进入售棉高潮,我们一路上

到处都看到收购站门前排着二里长的队伍。也有农民围住我们的车子,发出强烈呼吁的。他们请求地、县委的同志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要求我们向中央反映他们的困难。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收购的东西上边不调走,占用的资金要他们背利息。光棉花,周口地区一个季度就贴进去几百万。

我们的干部都是些穷惯了的人,对富裕缺乏思想准备,对于因兴旺带来的困难,似乎重视不够。我们在采访中受这种情绪的感染,总觉得有东西卖不掉,比没东西可卖,是个令人愉快的困难。县社干部在谈起这类问题时,尽管也发牢骚,也抱怨上级,但心情上比起当年解决救济粮款时,轻松多了。

农民对我们党的感情很深。就是三天三夜排队卖不掉棉花,就是拿着钱东跑西跑到不到化肥,能有今天的“卖不掉”和“买不到”,农民还是感激的。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这一点,那对自己的要求就太低了。扶沟县吕谈公社有个叫李庭芬的农民同公社订了明年交售万斤小麦的合同。她不要奖售工业品,她说:“我嫁过来二十年,吃了十八年统销粮,不给奖售我也要卖,这个恩我一定报。”这位农妇的感情当然是真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对农民的挑战淡然视之。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个最活跃的因素。农民的挑战实质是在推进工业、商业发展,推着工业前进,是件好事不是坏事。但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不及早设法解决,它也会把你冲击得东倒西歪的。



江苏省徐州、淮阴两个地区连续两年粮食大丰收,县社社员囤多仓满。宿迁县来隆公社粮站积极采取措施,把大批新粮囤积在露天,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丁峻摄

领导带头约法三章 分配方案张榜公布

富阳县农资公司卖化肥不开“后门”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富阳县农资公司在化肥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坚持按计划合理分配化肥,不开后门。今年全公司分配和组织到的9,909万斤化肥,全部分配给44个基层供销社,使全县每亩水稻平均每年分配到化肥150斤。

这个县的农资公司供应化肥不开后门,是从个别职工私下里擅自开罪,克扣农民应得的化肥一事中吸取教训的。随着农村双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对化肥的需求量大增加。就在这时,有个职工的热人找上门来,要买50斤化肥。这个职工便私自向批发部开票,走了“后门”。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一面对该职工和批发部经办人进行了教育(并扣了公司那个职工一个月奖金),一面以身作则,约法三章,保证不开和不批化肥走后门的条件,化肥分配方案由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并向基层供销社和农民张榜公布。党支部书记有,四名家属在农村,但支部委员带头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带头不走“后门”。一次,支委金守盛的亲戚给他送来11根两米多长碗口粗的杉木,要求他在分配化肥上给予“照顾”。老金说:“公司的化肥我不能动,供销社的后台我也不能碰!”他一根木头也没有收下,就把亲戚劝回去了。支委、副经理孙乃灿家在农村,今年夏收复种期间,他爱人身体不好,请了两位兄弟来帮忙,这两位兄弟就跟他协商:“劳动力帮我们你的忙,化肥你要帮我们的忙。”孙乃灿深知两位兄弟化肥不足,但他没有动用公司里的一斤计划内化肥,而是自己花钱去买了100斤平价化肥支援他们。由于领导以身作则,职工们都自觉遵守制度,不走后门。

县农资公司为了将化肥如数送到农民手里,还通过县广播站向全县农村社员交代每季每亩水稻田可供化肥的数量;通过基层供销社的黑板报向群众公布,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之后,他又组织力量,协助基层供销社改进化肥分配方法,将化肥按亩数分配到队户,由大队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许多农民反映:今年供应化肥,看得见,摸得着,如数到手,“后门”算是关死了。

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和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

多扶桑蚕丝绸联合企业办得有声有色

本报讯 记者彭自襄报道:四川省西充县多扶桑蚕丝绸农工商联合企业,认真履行国家计划,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和国家计划之间的新矛盾,使生产发展快,经济效益高,投产两年半就产生丝122.26吨、绸织37万米、织绸缎被面4万多米;为国家提供税金25万元,还安排了900多个劳动力就业。

这个联合企业是1979年在国家扶持下,由西充县多扶区的各社队和部分社员自愿入股办起来的联合企业。1980年全区栽桑170多万株,企业1.3万多张,产茧74万斤,为企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原料。但到去年,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出现蚕茧不足,严重影响了生产。当时有人主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派人外出收购原料;有的主张请国家调拨原料支援。联合企业股东大会认真讨论后认为,社队企业应立足于本地资源,既不能与国家争原料,更不能依赖国家支援。他们积极协助区、社落实蚕茧生产责任制,把蚕农的生产纳入计划。同时,企业所属蚕站收购蚕茧严格执行国家规定价格,依质论价,促使蚕农精心经营。企业还决定入股社员按合同交给企业的蚕茧,可得到一定数量的红利。这些措施,进一步调动了蚕农栽桑养蚕的积极性。去年蚕茧大丰收,企业的收购量较1980年增加20%以上,上车率达95%,今年上半年收购量又有增加。

这个企业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和外贸部门的具体要求安排生产,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坚持薄利多销。他们经常对职工进行“质量第一”的思想教育,并采取了相应的经济管理措施,使工人精心操作,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经省商品检验部门的检查评比,去年他们出产生丝正品率达92%,今年上半年又上升到98%。在产品销售上,他们坚决执行国家计划,把合格的生丝全部交给外贸部门。省外有些企业曾多次来函电或派人前来,愿以高价购买或用紧俏原料换取生丝,都被他们拒绝了。

这个企业去年实现产值524万元,超额28%完成全年计划,比1980年增长80.5%。企业按国家规定完成各种税金19.1万元。今年上半年生产继续发展,到6月底,已完成67万元的新计划。

农用药菌素具有防腐效果好、毒性小、使用安全等优点。

“120”农用药菌素是新研制成功的一种农用药菌素。它对多种农作物的真菌病原菌,如瓜类白粉病病原菌,棉花枯萎、黄萎、立枯病病原菌,水稻稻瘟、纹枯病病原菌,烟草赤星病病原菌,甜菜褐斑病原菌,都有较强的抑制和杀伤作用。经试验证明,这种农用药菌素对人畜无毒。

“120”抗菌素内吸性较好,喷在叶面半小时即进入叶片内,在植物体内存留72小时分解。据多次试验表明,“120”抗菌素对小麦、蔬菜的防病效果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

——在山东、河北两省的7个17个试验点,防治小麦锈病的小区试验和大面积示范,效果一般为70—80%,高的达90%以上。喷上“120”的

充分利用河滩、岗地、低洼地

当阳县当年植桑养蚕当年受益

本报讯 通讯员郑邦惠报道:湖北省当阳县今年充分利用河滩、岗地、低洼地,植桑1.1万亩,养蚕3,983张,产茧收入28万多元,实现了当年植桑、当年养蚕、当年受益。

当阳县有1万多亩河滩、岗地、低洼地,前几年一直是粮棉“帮困田”,没有很好发挥效益。去年,县委书记艾光忠对这类

“帮困田”进行了全面考察,又派人到江浙一些地方取经。年底,县委说服和发动群众,改“帮困田”植桑养蚕。今春,县政府从地方财政中拿出61万元,从外地买回1,408株桑树苗,低价价给适宜植桑的社队栽种;先后安排5,000多张蚕种,分给社员饲养;拨出1,000多吨化肥专作植桑之用。植桑社

队的群众狠抓桑园管理,认真修枝整形,中耕除草,追肥培肥,打破了“头年保活,二年小养,三年受益”的植桑老习惯,做到了当年植桑、当年养蚕、当年受益。今年6月湖北省蚕业研究所所长来当阳县考察了全县的桑园后说:象这样当年植桑蚕受益的情况在全省少见,值得总结推广。10月中旬,县委和县政府召开了桑蚕劳模会,给取得突出成绩的生产队、社员和有关单位发了奖。



内蒙古察右中旗那日斯太国营林场根据周固社队牧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加工成套蒙古包(毡房)和碗柜以及木桌等家具,受到广大牧民的欢迎。图为加工女工正在涂刷蒙古包的零件。

种草养羊 沙区致富

高家沟公社摘掉“三靠社”帽子

本报讯 通讯员田捷报道:陕西省靖边县高家沟公社种草养羊摘掉了“三靠社”的帽子。目前,全社养羊1.6万只,户均20只,人均4只。

这个公社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过去是牛羊满山坡的好地方。前些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重粮轻牧,社员日子越过越穷,成了“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社”。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公社党委认真总结教训,他们算了三笔帐:一是养羊投资少,收效快。起庄大队种草羊3,000多只,人均5只。仅剪毛一项,每年就可收入4,000多元,人均25元以上;二是养羊可以促进粮食增产。一只羊一年的粪施到田里,每亩约可增产15%以上,三是种草养羊比毁草种地合算。种一亩草用来养羊,光用羊粪增产的粮食,就比毁一亩草地种粮的产量还多。通过算帐,使大家认识到向高家沟要富,必须种草养羊。全社成立起21人的种草专业队,常年抓种草建设。全社家家养羊,一般每户养30只以上,多的50多只。这个公社粮食产量1977年170万斤,去年增加到240万斤;人均口粮600斤,每年养羊收入达9.6万多元。

魏殿林摄

湖邦公社社员纷纷订购苗木

本报讯 通讯员郭同生、张永报道:福建省龙岩市湖邦公社的社员们,最近纷纷跑到公社,要求订购苗木,到10月15日,已订购柑桔、茶、桃、竹、药、杉等苗木78万株。

湖邦公社地处山区,近几年公社发动群众上山造林,明确宣布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并于去年秋划给社员自留山6,800多亩。但是,社员对政策有些疑虑,公社把苗木送上山也没人种。社员们学习了十二大文件,解除了心中的疑团,抓住秋收前的有利时机,在自留山上劈草整地,全社自留山已整地挖穴1,720亩。

庆云县建立良种鸡鸭繁殖中心

本报讯 山东省庆云县委、县政府把养鸡养鸭这一传统的家庭副业列入议事日程,组织人员积极引进种鸡鸭,建立繁殖中心,促进全县鸡鸭饲养技术提高。

今年春天以来,庆云县委、县政府针对全县鸡鸭品种混杂、经济效益很低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调进良种鸡鸭。为了解决良种鸡鸭饲养管理的技术问题,这个县还从外地聘请了部分技术人员,举办了200多人的培训班。同时,还安排兽医、食品部门搞好饲料加工,安排兽医部门搞好家禽防疫工作。

方兴未艾的优势

——充分发挥杂交稻增产优势评述

本报记者 鲁南

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培育的杂交水稻问世以来,载誉世界,为我国粮食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这两年,有议论说:“杂交稻增产优势减退了,鼎盛期已经过去,没有更大作为了。”

究竟杂交稻发展前景如何?还有没有增产潜力?记者访问了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专家和种子的负责人,他们的回答是乐观的。他们以大量令人信服的材料预言:八十年代,杂交稻增产优势将仍为发展粮食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

由于杂交稻具有明显的优势,自1976年以来,我国杂交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1976年至1981年,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累计面积3.3亿亩,计增产粮食300亿斤,为其它水稻良种所不及。杂交稻增产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并不是说这方面的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杂交稻有种子混杂退化现象,就是问题之一。据测定:种子混杂1%,每亩减产8至10斤,如混杂15—20%,杂交稻的增产优势就基本抵消了。杂交稻的优势同混杂退化劣势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情况下,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但是,通过人们的工作,又可以防止这种转化的发生。这不仅是在理论上的推论,而且已为许多地方的实践所证明。广西农学院和江苏省湖西农场科研等单位

采取一系列科学措施,杂交种子的纯度都在99%以上。杂交稻种子生物学混杂是可以控制的;在种子收、晒、脱、装、运时,健全制度、增强责任心,备置专用农具,也可以避免种子机械混杂。科学工作者大量研究证实:退化是混杂的表现,是各种变异群性的退化,而不是种性的退化,更不是“返祖”现象,也就是说,只要避免混杂,退化是可避免的,杂交稻增产优势是稳固可靠的。有些地区,制种成本高、产量低,这是影响杂交稻推广的另一个因素。杂交稻制种比常规稻费工费贵,制种户得不到实惠,制种积极性没有足够的种子,推广杂交稻势必受到限制。个别地区制种质量差,产量低,主要是由于分散制种造成的。因为分散制种,隔离难以保证,生产方式又比较落后,管理也不够完善。为了克服这些弊病,一些杂交稻种植区,建立了“省提县繁县制”或“省提县繁社制”体系,例如江苏省

徐州地区集中连片制种,单产比分散制种增产32—56%。1981年全国制种平均亩产近100斤,种粮兑换比率由1:12或1:15下降到1:10,杂交稻的声誉大大提高,成为农民倍受欢迎的良种。有的农民步行百十里买杂交稻种子,种子公售种时,门庭若市,很是热闹。

推广杂交稻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农民用种选择的积极性问题。农民在这方面的顾虑主要有两条:一是怕选种指挥的亏,怕交种粮不往住,二是种粮交种粮技术性强,怕自己种不了。解除这些顾虑,靠强迫命令不行,只靠口头宣传也不行,只能具体帮助他们解决技术上的难题,通过示范,引导农民种植。湖南湘潭有个生产队,上面一再要求种杂交稻,就是不种。县种子公司便和他们签订试种合同:生产队出土地、劳力,种子公司包技术指导,超产部分种子公司提成15%,减产种子公司包赔。当年试种,亩产800斤,比常规稻增产200斤,农民

信服了。第二年,没动员,农民自己种的杂交稻占到水田面积90%。

当然,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以后,大面积推广杂交稻仍要采取科学的慎重的态度,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操之过急,一轰而上。否则,欲速则不达。杂交稻推广成功,是水稻栽培的一项重要革命,它在繁殖环节,栽培管理上都有创新,前后很多道环节,环环紧扣,有的地区缺乏技术力量,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种杂交稻,结果出力不增产。因此,在这些地区,培训技术骨干,迅速建立起技术专业队伍,普及科学种田知识,是推广杂交稻的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杂交稻组合种类还不够多,这也是不能进一步大面积推广杂交稻的一条重要原因。现有杂交稻组合少,不能适应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温差悬殊,水土、气温、日照等条件千差万别的情况,这就需要发扬当年全国协作攻关的精神,争取短期内有所突破,培育出数目众多的,具有强优势、耐旱抗寒、抗病虫害、早熟等特性的新组合。

我国种粮杂交水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要加强领导,注意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和认识问题,采取切实措施,“绿色王国”中的明星,定会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农业知识

全国先进施工企业、集体和个人代表大会倡议

深入开展创全优工程和技术革新活动

万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勉励基建战线职工从勘察、设计到施工都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全国先进施工企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今天分别授予32个施工企业和38个集体为“全国先进施工企业”、“全国施工企业先进集体”称号，授予61名先进个人为“全国基建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并向他们分别颁发了奖章、奖状和劳动模范证书。

荣获全国先进施工企业和先进集体称号的有：邯郸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上海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山东省诸城县建筑公司、石油部第四工程公司、化工部第二十二工程建设公司、水电部第八工程局、煤炭部淮北煤炭指挥部第三工程处猛虎掘进队、河南省漯河市东风建筑公司、冶金部北京冶金矿山建设公司马万水工程队等单位。荣获全国基建劳动模范称号的有：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林庆青年突击队队长隋世忠、邯郸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朱林生、四川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二处灰砂班班长吴培珍、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科技研究所工程师许

宁、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第六工程公司工程师贾鸿谟、福建省闽江水力发电工程局总工程师马钟昕、大庆石油管理局油建公司二大队电焊工王建民、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二工程处架干班班长王经波等。他们的事迹与经验，突出地反映了基本建设战线广大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充分显示了广大职工刻苦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努力从事四化建设的崭新面貌。

中国经济贸易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为主团的中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火车回到北京。

国务委员康世恩、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和朝鲜驻华大使全明洙等前往车站迎接。

黄华分别会见喀麦隆和巴西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下午分别会见喀麦隆新任驻华大使约翰·肯贡贡、莫尼埃和巴西新任驻华大使伊塔洛·扎帕。

中国佛教协会护送大藏经代表团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香港电 中国佛教协会护送大藏经代表团结束在香港访问，11月1日乘火车离香港经广州回到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出席了今天的授奖仪式并讲了话。万里说，基建战线的广大职工，对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你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我们搞基本建设，不仅速度要快，更重要的是工程质量要好。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如果工程质量低劣，将给生产和使用造成长期的不良后果。因此，对勘

察、设计到施工都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施工质量不好的，不能验收；工程质量长期达不到国家标准

的施工单位，不能让他们承担工程任务。万里说，基建战线广大职工，长年累月露天施工，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比较艰苦，我们各级领导要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积极解决他们的住房、子女升学就业、文化娱乐等问题，使广大职工始终保持旺盛的士气，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政府文化代表团离京赴南美五国访问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以文化部副部长吕志先为团长的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6人，今天乘飞机离京去哥伦比亚访问。

这是中国派往南美国家的第一政府文化代表团。代表团还将访问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访问期间，代表团将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分别签订文化协定、文化交流计划，或商谈文化交流事宜。吕志先对记者说，中国希望在今后逐渐增加与这些国家和其他南美国家的政府间和人民间的文化交流。

《前柏林皇家瓷器厂瓷器展览》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前柏林皇家瓷器厂瓷器展览》今天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前柏林皇家瓷器厂是柏林一个古老而闻名的于世

昆明部队

树立一批精神文明标兵

本报昆明专电 记者周奋、王志松报道：昆明部队党委最近决定，树立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涌现出来的8个先进单位和14名先进个人为集体标兵、个人标兵，同时对47个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予以记功表彰。

被树立为标兵、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都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新典型，深刻地反映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风貌。特别是那些在边防对敌斗争前线不畏艰险、勇于献身的一

批先进单位和个人，以及在部队科研、医疗卫生和边疆贡献力量。

著名哲学家贺麟入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洪启报道：八十高龄的著名哲学家贺麟教授最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贺麟以研究黑格尔哲学在中外哲学界久享盛名。解放后，贺麟按照党指引的方向，走出书斋，改变以往“闭门做学问，静观世界”的脱离实际状况。多年来，不管在顺利的日子里，还是身处逆境之中，贺麟总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动摇过对其共产主义的信念。10月14日，这位阅尽沧海桑田的老人得知上级党组织批准他入党的喜讯时，兴奋地说：“入党后应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贯彻党的十二次通过的新党章要求去工作和生活。”现在，他正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整理几十万字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讲稿、西方哲学史讲稿、论文等。

受到法律制裁的“汽车大王”及其同案犯



上图：陈海海等人倒卖的部分汽车，下图：本案罪犯（左起）陈海海、耿振华、曹振山、陈俊毅、靳殿旺、陆树振（新华社稿）

成员，都不是天生就是先进分子的。他们有的曾经生活在旧社会，有的生活在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带着旧的思想影响进入党内，还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受到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必须经常自觉地改造自己，注意同这些旧影响作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如果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停止了，各种不正之风泛滥开来，党就不能担当起领导革命的任务，而且它本身也会逐渐腐化下去，以至灭亡。所以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存存亡的问题。而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抵制各种旧思想的侵袭，克服不正之风，是党所担负的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实际上，旧制度的思想习惯对于党的影响，党内的不正之风，历来就有。过去，党正是在不断同它作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当前党内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泛滥，是由于十年内乱的结果没有完全清除，也是新条件下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重新泛起和它的腐蚀作用有所增长的一种表现。应当看到，在我们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旧制度的思想习惯的影响还会长期广泛地存在。而消除十年内乱在党风方面造成的消极后果，比消除它在物质方面造成的后果要艰难得多。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上述种种情况和道理也同样可以说明，不正之风在党内是非法的。它与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根本不相容，是党所要改造和清除的对象，它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党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它除了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尽管有些党性不纯的党员和干部可能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谋取私利，但是这些行为在党内是非法的。从党的宗旨、党的路线和党中央的领导来说，从党的整体来说，没有任何需要和理由去掩盖或保护自己队伍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和不正当之风；相反，为了阶级的和人民的利益，党必然会以最大的决心去清除自己队伍中的这些阴暗面。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其次，我们党拥有同自己队伍中不正之风作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无产阶级的前进立场，决定了我们党能够掌握和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列宁说：“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它们是不承认亡的，因为我们不但不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我们正是这样，靠着正确使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多次地从克服错误和危难中恢复和壮大起来。十年内乱之后，由于党不仅有自我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勇气，而且能够历史地、正确地进行自我批评，因而能迅速地完成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并使党风有了显著的好转；同样，靠着正确使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继续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污泥浊水，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关于党内的不正之风，因为它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要从看到同它作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因为它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性质和它所拥有的自我批评的武器，所以要从看到它被克服的必然性。这就是我们应有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

为使党风根本好转，十二大决定从明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是基于对党内状况的正确分析提出来的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步骤。近几年来，我们党进行的清查林江帮派体系、端正思想路线、落实干部政策、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贯彻党内生活准则等各项工作，直至今年开展的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整党；或者说都包含着部分整顿的内容。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集中全面的整顿。而为了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没有这种集中、全面的整顿是不行的。

整党，是我们党的一种创造，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认真负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又慎重的组织清理。从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当然，在犯“左”倾错误的时期，也有过深刻的教训。这次整党，是在遭到十年内乱破坏而又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以后进行的一次全面整党，是在党面临新时期伟大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全面整党，因而必须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注意运用以往的成功经验，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以来的优良传统，把这项工作做好。这样，就一定能够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

（上接第一版）然而如果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而没有全党在这个基础上的高度一致，正确路线就不可能得到贯彻，党就不可能有战斗力。现在，完全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实现全党一致的正确思想政治基础。但是决不是说，这一方面的党的建设的要求已经实现了。第一，正确思想政治路线的建立，是党中央的领导、党的整体性的。要使各个地区、各个地区直至每个基层的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自觉地接受、理解和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执行，这是一件艰巨的工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经过十年时间，中间还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整风运动，才达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现在，我们的有些党组织和党的干部，仍然没有学会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情况去实现中央提出的方针、任务，而习惯于上传下达，或者根据局部经验、错误认识，而自行其是。因此尽管中央有很好的政策，在他们那里却没有很好地贯彻。我们还不应该低估这样的情况：党内至今有些人对于中央的正确路线抱怀疑态度。有的是从“左”的方面，留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认识；有的是从右的方面，欣赏、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们时而在这个问题上，而在在那个问题上提出对正确路线的怀疑和不满。而且这两种倾向在客观上又往往互相利用、互相补充。这是当前党风不正的重要表现之一。所以，坚持正确路线，在全党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需要经过艰苦的思想教育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第二，即使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制定和实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原则，本身就是作为一个过程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个过程。虽然它的基本方向 and 主要点已经指明，但不能说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已经完全掌握，还有许多具体的制度和办法需要继续探索。而且随着实践的向前推进，还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和政策，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保证现行正确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保持和巩固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关于全党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和实践，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除了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有力量

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为少数人自己或一党一派谋取私利的政党都相继被淘汰，而唯有我们党获得人民群众最广泛拥护，在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前，都将永远生机勃勃的根本原因。问题在于，自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以后，在这方面就一直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使得有的党员和干部有可能骄傲起来，滋长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各种机会去占群众和公家的“便宜”，谋求私利和特权；也使得某些动机不纯的投机钻营分子力图钻空子，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防止而任其泛滥开来，就必然会损害党的先进性，使党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甚至会使得党的某些部分和成员腐化变质。由于十年内乱期间党的组织被破坏，这种现象果然在一定程度上泛滥开来，成为目前党风不正的一个

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还应当看到，执政党的地位使党的领导人拥有比过去更大的权力，易于滋长家长制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而如果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又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各行其是、自由主义等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损害党的集中领导和行动一致。总结我们过去犯错误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除了思想政治方面的错误以外，最严重的教训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遭到破坏。新党章充分注意和吸取了这一教训，对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作出了充实而具体的规定。现在，从中央和许多地方党组织来说，已经逐步实现了政治生活的正常化，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十年内乱”在这方面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至今仍然在不少党员、干部和一些党的组织中存在，妨碍着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这也是当前党风不正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必须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和各项规定，努力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按照上述三项基本要求加强党的建设，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大大提高全党的政治素质，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坚持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

三、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新的历史时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目前党风不正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比较严重地存在，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争取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就成为今后几年内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

十二大提出在今后五年间争取实现国家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这三个好转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一方面，我们应当把社会风气不正完全归因于党风不正，因为社会上有些许多歪风邪气正是党风不正引起的，相反地是影响党风不正的一个因素；但另一方面，党风不正对社会风气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只有坚决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把党整顿好，我们党才能够有说服力地教育和团结广大群众，纠正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以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振奋起群众的建设热情，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和对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从这个意义说，争取党风根本好转是全面实现十二大任务的一个关键。

党的建设的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对当前党内状况和党风不正的现象作出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是开展整党工作、争取党风好转的出发点。

十二大报告对于当前的党内状况作了正确和深刻的分析：一方面，即使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损害以后，我们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强有力的；经过几年的恢复和整顿，党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主导的一面。另一方面，目前我们确实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报告列举了党内不正之风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指出：“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我们决不允许夸大但也决不容许揭露党的这些阴暗面”。这种分析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只要我们对客观的态度同回顾一下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有力在各方面

的巨大变化，就不能不承认党的队伍的主流是纯洁的、强有力的，不能不承认这几年中党风有了显著进步。当然，只要我们同样地以客观态度观察一下周围

的现实，也就不能不承认党内确实存在若干阴暗面。许多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对于共产党员（包括党员干部）的情况调查也表明：大部分党员是合格或者基本合格的；有少数不大合格或基本不合格，但是经过教育，其中绝大部分可以转变为合格的党员；只有极少数根本不合格，或者简直是腐化变质分子。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报告关于党内状况的分析的正确性。

为了理解报告的科学估计以及提出争取党风根本好转

根据，还必须对党内不正之风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为什么一定会被克服，作深入的分析。

首先，党内产生种种不正之风，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这是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对党的健康机体的侵袭，犹如周围环境中各种病菌对于人们健康机体的侵袭一样。我们党的所有

“八一三”前后，我结束了在上海的写作生活，辗转到了西安。一天下午，我坐人力车到叶以群同志的住处，告诉我我要到延安去，他说他可以给我联系，叫我耐心地等待通知。三天后的深夜里，我接到一张秘密条子，叫我翌晨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精神为之一振，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天未亮我就起床了，带着介绍信，坐人力车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热情接待。第二天，就让我坐上一辆军用大卡车，离开西安。

在这辆军用大卡车上，共有十来个人，都是去延安的。其中有三个广西的青年，三个江苏女学生，几个从国民党政府监狱里刚放出来的“政治犯”，还有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和他的孙女。

军用大卡车第一天晚上到达宜君，第二天晚上到达洛川。第三天，整天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我满脸满脸都是黄泥巴。傍晚，军用卡车在一排窑洞前停下来——呵，终于到达延安了！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1937年11月25日。进城后，我被分配在靠近城墙的一个招待所里，我第一次吃到了小米饭。当晚，董纯才同志来看我，他先几个月到这里。

第二天清早，我和滕旅芬、王梅芳等女青年一起渡过延水到清凉山下的陕北公学去参观，遇到周扬同志，他把我的情况介绍给成仿吾校长。

我们在陕北公学玩了一天，见到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青年学生，他们都是抗战爆发后，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为了抗日救国而来到陕北公学学习的。

晚上，艾思奇同志来看我，很高兴地对我说：“好了，你也来了”，同我长途跋涉的情景。次日，太阳初升的时候，我和艾思奇同志一起到抗日军政大学参观，抗大的校舍都修满了人，一进去就看见大门上用蓝色油漆题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在校长办公室里，思奇同志把我介绍给罗瑞卿同志。在学生宿舍里，我遇到一位从上海来的女同学，是我慧姑的内亲，我们畅谈上海的情况，他带来慧姑对我的时候。在抗大，我看到“战歌社”主办的墙头诗，其中有一篇是柯仲平写的。

过了一星期。有一天晚上，边区政府的秘书长伍修权同志来慰问我，我把我的两本科学小品集《细菌与人》和《抗战与防疫》赠给他，作为见面礼。

第二天，伍修权同志又来，说我把这两本书，写得很好，他很赞赏，并派冀晓夫同志接我到边区政府教育厅的土山上。那土山上有一排窑洞，我和教育厅的秘书同志同住一室。

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刚从苏联回来。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称我是赤色科学家，要给我很好的待遇，每月发给我20元零用费。当时领取高标准生活费的只有白求恩大夫和我。我在教育厅的土山上住了一星期。

第二天早上，冀晓夫又来接我，他带了一匹骏马，扶我骑上马背上，因为我当时已经成了不能走路的人了。接到边区政府招待所去暂住。

这个招待所，不是土山，不是窑洞，是砖瓦盖成的四合院。我住在东侧的厢房里，和一位经济学家同住。

对面厢房里，是白崇禧派来的专员刘容客先生，他是从广西来的，和我谈起广西的情况很投机。

夜间很冷，已冰天雪地，北风怒号。我要上厕所，勤务员帮助我穿上衣服，扶我到西边露天厕所去，我感到陕北气候的威胁。于是，翌日我迁到北屋，北屋生着火盆木炭火。边区政府又发给我一套军装，我成为八路军战士了。

1937年12月31日，除夕晚上，为了庆祝新年的来临，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设宴招待我和从重庆来的以张子高为首的陪战队。席间作陪的有傅连璋、马海德、苏井观、贺诚等同志。宾主频频举杯，祝酒，欢叙友谊，并为抗日统一战线线的成功祝贺，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

宴餐后，伍修权同志陪同我到边区政府的小礼堂去观剧。有一位老妇把我背进会场。会场里的空气很热烈。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人们喊。一个高大身材的人，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军装来了，大家都起立致敬。我匆忙起立，毛主席来到我的身边坐下，坐在前排一条板凳上的伍修权同志介绍说：这就是科学家高士其同志。毛主席和我亲切握手，问道：你在这里过得愉快么？生活如何？需要什么？我回答说，我在这里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什么也不需要。毛主席的手多么温暖，象热流一样流过我的全身。

我是多么激动呵！多么兴奋呵！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太感谢了。回到招待所里，夜晚久久不能入睡。

1938年元旦，我搬到陕北公学，住在成仿吾校长隔壁的窑洞里，何干之同志是我的北邻邻居；吕驥同志在高处，下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个讲台，党的领导同志常来这里作报告。

在我住的窑洞里，我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陕北公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学生中，每个人都有一部可歌可泣、可悲、可颂的历史，有的受了伤的游击战士；有的是煤矿工人；有的是印刷工人；有的是医师；有的是护士；有的是地下工作者；有的有一条腿，扶着拐棍；有的是童养媳；有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女；有的自称是穷人可敬的朋友，她的名字叫做黄友芳。

他们围在我的身旁，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问我学习、工作和生活上各种问题，向我请教。他们认为：我和病魔、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和毅力，是难能可贵的。我买了不少花生米，请他们吃。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阅书，忽见有一人掀开门帘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我急忙让坐，毛主席就坐在我的对面长板凳上。他先问几句，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回答一切都很很好，在革命的大家庭里，生活过得很愉快，很幸福。接着他侃侃而谈，给我讲抗战的形式和我们今后的任务；给我讲古典自然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并鼓励我说：作为革命的科学家，应该研究自然辩证法。

延安回忆录

高士其

今年七十七岁高龄的高士其同志为了给后人留下革命史料，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经常每分钟只能写四个字），写下了许多回忆录，这里刊登的是其中的一篇。

——编者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窑洞门口听报告，毛主席路过，很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很勇敢的，并勉励我要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牢记毛主席的这句名言，作为我的座右铭。

有一天中午，陕北公学教务处举行聚餐会。毛主席也参加了，我也在座，还有成仿吾、何干之、吕驥、邵式平等同志。

在“八一三”周年紀念日的日子里，我从马列学院骑一匹老马，由照顾我的红小鬼陈世富同志扶着到达会场。陈世富把我搀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都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是一和我握手。毛主席来了！台上下都向他欢呼鼓掌。接着选举主席团，我和丁玲都当选了。我向台下招手致意。台下人激动，人群中不断响起掌声和口号声。他们都是八路军战士和青年学生，都是我们可爱的战友。毛主席分析了抗战形势，表扬了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需要们的。这是一次抗日救亡的盛会，是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散会后，陈世富扶着我骑马回到马列学院。

有一天下午四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来石窑洞探望我。他了解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就命边区政府的交际处长金城同志带来一个红军护士张宜秀同志，来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后来，又换了一个护士，她才十八岁，红润的面孔，矮胖的身材。北京解放后，我还在北京医院见过她一面。

陕北公学派了一位女青年学生金敏清同志作我的秘书。她除了帮我写作，或我口述她笔录，每天晚上还帮我记日记。

初夏，有一天躲空袭警报的时候，我躲在成仿吾校长的窑洞里，那次周副主席来陕北公学作报告，也来这个窑洞里暂避。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周副主席亲切地和我握手，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并对我说：边区政府已派人到香港去购买我所需要的药品，共约六千片，可供我在边区三年之用。我听了后感到无比的兴奋，党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了，给我们作报告，介绍战场上的最新战况。他说，只要我们军民一致，同心同德，协同作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日寇必败，我军必胜，中国的前途无量。大家听了都一齐拍手称快。

在陕北公学，我和董纯才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国防科学社”，其宗旨是防空、防毒、普及国防科学知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国防文学在陕北》，发表在《群众》月刊上。我们还组织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出席者有：董纯才、陈康白、钱乐秀和许多等人。在座谈会上，我们轮流阅读了仅有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逐章逐段地讨论。我们一共只开了四次会，当时的手稿，今天不复存在。在《解放月刊》上刊登了一则简讯，边区的“新哲学会”成立了，我也列为委员之一。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从石窑洞到边区医院去参观，傅连璋已在医院前的山口迎接我们，他们陪同我们参观了医院的设备。医院共有病床一百多张，所有医疗器械医药用品都是老庆龄同志从“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基金中拨款购买、捐献来的。

医院共有医师十几人，包括两个国际友人，一个就是马海德同志，是美国的共产党员。另一个就是著名的白求恩大夫。后来，他在晋察冀为了细心救护八路军战士，自己受了感染而牺牲了。

院长傅连璋是毛主席的医生，在福建长汀的时候，就跟着共产党。他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的。后来，他们欢迎我搬到陕北公学医务所的山上。阮雪莹、我和医师何武坦、李振勋、护士阎绿琴、龙静娴等同志在一起生活。我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医学座谈会，提出十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有：医学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农民、为孩子们服务；要讲医德，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革命精神；要以预防为主；要讲科学，用科学；要注意老年人的保健；要消灭传染病；要使用雷、噬、电，各得其所；要做到人人健康。如果真能做到这些的话，对抗战是有利的。我们还举行一次细菌学讨论会。我们觉得生活很幸福。后来因陕北公学一部分要迁往佳县，我们分别了。李维汉同志代校长为我们举行了分别茶话会。在土山下，在一排窑洞前面，李维汉同志讲了话，表扬了这些英雄的医务工作者们，这些年轻的医师和护士们。同时，对我的工作也表示谢忱。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段的生活。

西北旅社，是延安独一无二的旅社，都是平房和砖地。我从陕北公学的土山上搬到这里以后，就住在靠大门口的一个狭长的小房间里，丁玲同志住在我的对面。

丁玲同志是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刚到延安的，团员有周敏珊、崔嵬、丁里等人，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带来不少的服装和道具，我们能在延安团聚在一起，感到十分亲切和可贵。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到边区文协去听诗歌朗诵会，著名诗人柯仲平、何其芳、卞之琳等出席，他们也写了一首歌颂延安的诗篇，这是我在延安写诗歌的处女作。会上，由柯仲平同志代表我朗诵，大家都觉得这首诗颇有意义，能鼓舞勇士们的斗志。不能走路的人也要到延安，进步人士谁来延安？这首诗后来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文艺突击》上。在陈诗昭著的《延安访问记》里，也收入片断。

我又参加了边区文协的聚餐会，聚餐时周扬同志和陈伯达都讲了话，祝边区文艺创作繁荣。

柯仲平同志和丁玲同志扶着我上楼。入席后，我见到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小说家陈学昭，画家华君武，木刻家古元，音乐家吕驥、马可，电影导演陈波

儿，等等，济济一堂。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远千里、万里而来，响应党的召唤，聚集在革命圣地。

从西北旅社，老乡用一块木板把我抬到边区党委住的土山上，在西侧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住下，由红小鬼陈世富同志照顾我，还有一个秘书，是上海来的地下党员景群同志。我写了一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文章，发表在延安的《新中华报》上，这是我以崇敬的心情，对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怀念。我要学习他，学习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第二天清早，我开席的时候，就可望见北面隔壁的土窑洞前，陈云同志在作早操。

晚上，方紫同志来看我，也愿意当我的秘书。妇联的叶晓同志也来陪我，我觉得颇不寂寞。马列学院送来俄文和英文图书五十多本，其中有《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些书在当时很难得，都是无产阶级的珍宝。我如饥似渴地开始我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从清凉山党的出版社，每月都赠给我新印刷出来的《列宁选集》的中文译本。

有一天傍晚，小鬼陈世富扶着我，在山坡上散步，不知不觉走到艾思奇同志住的窑洞。我便去看望他，他正在木桌旁写作，和我攀谈了一会，他告诉我前线和后方许多新消息。他说：李公朴先生就要从山西太原回锡山那里来延安访问了。他还说，毛主席就在他山下一所宽敞的窑洞里住。那时候天已黑，毛主席工作繁忙，我不能再去打扰他了。

在边区党委委住的土山上，我还到过邻近的新华书店，去购信封和信纸，见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几位老朋友张欣等人。

小鬼陈世富扶我下山，到边区妇联去小坐，在那里，我见到吴瑛、赵峰，还有一位高同志，她们殷勤地接待了我。

中央组织部派夏云同志和我迁往马列学院。当时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同志和秘书长章冀白同志接见了我，把我安插在图书室外面的一个房间里暂住，这里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

马列学院的研究生都来和我谈话。早上，我和谢飞同志一起坐在图书室前面晒太阳、看书，我看的是《静静的顿河》英文本，我被这本书的故事吸引住了，爱不释手。前面有一排平房，是研究生的宿舍，我常到那里玩，和他们谈起我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作的情景，他们都听得入神。

在北面广场上，有一次开党的代表大会，我虽不是党员，但也被邀请参加了，我拿了小小板凳坐在后面旁听。

张闻天同志主持大会，大会发扬了党的民主作风，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发扬了延安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有了这种精神，就无所不胜。

晚饭的时候，我在图书室的房间里吃。在延安，我有20元的津贴，经济很充裕，我买了好多只鸡，陈世富同志帮我喂着，因此，我经常吃鸡，几乎每天都有吃鸡。那晚天上，吴瑛同志和苏灵扬同志来看我，我邀她们一块吃鸡。这对她们来讲应该是很幸福的。

一天早上，大家还没有起床，就传来嘟嘟的警报声音，日本飞机在延安城内投了一连串的炸弹，炸毁了城墙，炸伤了几百人，炸死4人，炸炸着窑洞的主人。我来不及穿衣服，披上我在西安买到的狗皮大衣，就往外奔，一个同志喊道：快卧倒！我就伏在草地上，听到炸弹声，此起彼伏，一阵又一阵。

后来，陈世富同志卷起我的铺盖，扶我上马，带我到小屯沟军区招待所去暂避。这里有二层狭窄的窑洞，我住在下一层。我的秘书方紫同志和爱人也来了。我看见有个伤员躺在土炕上，另一个士兵正在给他换药。据说这个伤员就是最近被日本飞机炸伤的。

在这个窑洞里，我款待了新自山西来的李公朴先生和他的爱人张曼筠，是艾思奇同志陪同他们来看望我的。老朋友异地相逢，感到特别兴奋和高兴，何况这个异地是革命圣地。我约他第二天再来。我叫陈世富同志宰了两只老母鸡，放在打铁用的铝锅里，放在木炭盆火上煮了一个多小时，鸡肉都煮得很烂，又可口，我把鸡献给远道来的贵宾，我想是很适当的。让鸡肉美味永远留在我们的齿舌之间吧！

李公朴对我说：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关心和爱护科学家的，你在延安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我很放心的。

后来，我知道李公朴曾到窑洞里拜访了毛主席。毛主席接见了，并设宴招待，和他促膝谈心，长达三个小时。毛主席还亲自到招待所里，回访了他。张曼筠曾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我在延安最后的一幕，就是由老乡抬着我，从马列学院到中央干部休养所。

中央干部休养所的小村安北郊的一条小山沟里，在一个名叫“陈团峪”的小村庄中，全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在那里休养病的大，都是重病号。其中有党和军队的干部，也有马列学院的教师、文工团的演员。

一到中央干部休养所，第一个认识的人是张若萍。他，一跷一跷地，拄着拐杖，个子瘦长，才25岁。

没几天，我就知道了这位张同志的外号，叫做“老大佬”。张若萍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过着艰苦辛酸的日子的。他来到革命队伍，仿佛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庭。不幸他的脚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只好到休养所休养。

我吃小米要便秘，红小鬼小陈就想方设法给我弄一点大米。有时候，他弄到一点面粉，就赶紧做面条

给我吃，——这是休养所里最好的伙食了。我本来还能够自己吃饭，由于病情加重，手不能弯曲，每顿饭都得靠小陈或者张若萍喂。

有一次，张若萍准备在休养所里挂几条标语，问我写什么好。我略加思索，说道：“就是写这里是病人的战场！”

“这里是病人的战场！”自从休养所里挂起了这条标语以后，病号们更加信心百倍地与疾病作斗争。

在休养所里，我结识了许多病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一位女病友叫苏菲，她因得了伤寒病，身体非常虚弱，来到休养所休养。还有一位小同志叫陈希，才十六七岁。陈希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受重伤，也被送到了休养所。我与张若萍、苏菲、陈希在一起学习、谈心，互相帮助，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后来，随着我们革命友谊的不断加深，“互助组”变成了一个“临时家庭”。张若萍是“老大嫂”，苏菲是我的“妹妹”，陈希是我的“干女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互相帮助，共同战胜病魔。

我在休养所还结识了邹文宣，邹文宣很喜欢文学，笔头很快，成了我的“特约撰稿”。他不仅能把我的口述的文字迅速记录下来，而且还能提出许多意见，帮我一起修改。

边区医院的院长傅连璋同志和美国援华的医学专家马海德同志，也经常骑马来给伤病员诊病。

在干部休养所里，遇到许多新事，如开荒，租秧歌，访问老乡，教老乡识字等等。

1939年元旦那天，我起来很早，坐在房门口看大家把休养所大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贴标语和墙头诗，病号们都欢欢喜喜围坐一个长桌旁，猜谜语，朗诵诗作，唱救亡歌曲。桌上有清茶、瓜子、花生米、核桃等，大家谈天说地，讲自己救亡的小故事。苏菲同志还特地把我《抗战与防疫》科学小品集中的一篇，《打花鼓姑娘谈蚊子》中“说痒痒，活痒痒……”朗诵给大家听。这一天伙食特别好，病员人人都加菜，能吃到新鲜的猪肉和豆腐，我因下嘴困难，只吃一些面粉充饥。

到了晚上，我们的党组书记王首道同志，也赶来参加我们的聚餐会。他很钦佩我的好学精神，嘱咐我安心静养，问我有什么困难和实际需要，可以向党组提出，还勉励我要作一个共产党员。我回忆起在1938年新年晚会时，第一次和毛主席握手的情景，心激动啊！半夜我睡不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1939年1月，我写了份入党申请书，由陈明和邹文宣两人介绍，支部书记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农村包围城市，以抗日统一战线为基础，坚持持久战，所以我的入党申请，也必须围绕这个中心。黄洛峰同志寄来一个包裹，一个方形的纸盒里，装着我的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和《细菌与人》，各三本，我拿两本（一件各一本）赠给毛主席，并向他汇报我入党的经过。

第二天毛主席就派通讯员送来他的亲笔回信，勉励我要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我收到信后，给我所在党支部的同志传阅，大家都向我祝贺，我是多么兴奋啊！多么幸福呵！

我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入党的，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向工人学习，向工农看齐。

经过党支部的讨论，大家都认为：我在干部休养所里，表现很突出的是学习，天天都在看报，是学习模范。三个月后，就批准我转正了。

我宣誓说：我愿意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为党、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

一天早上，组织上派林山同志来接我，他是边区文协的负责人之一。

九时我辞别了中央干部休养所和全体休养员同志们，以及所长、医生、护士。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张若萍、苏菲、陈希、陈明、周文官等送我上山，千叮咛，万叮咛，叫我保重身体。苏菲说，不要忘记了到香港后，要写信回来。

我带着一大麻袋的马列书籍，以及其他行装，由我的红小鬼陈世富同志陪伴着我，由两个青年力强、头上缠着白巾的陕北老乡，用一扇门板作担架抬着我，走，林山同志骑着一匹老马随同。

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时值初夏，林木葱葱，虫鸟鸣鸣。我们走了两个多钟头，才走了一半路程，到达中央组织部山下上窑洞口。陈云同志因工作太忙，派秘书夏云同志接见我，并交给我一封秘密信件，证明我是正式共产党员。

夏云代表陈云同志嘱咐我到香港后，要安心治疗，安心养病，这是我的战斗任务，不要急于工作，来日方长，能把病养好，就是胜利。我听了这一番话，心中无限激动。我和夏云同志，紧紧地握手告别。又走了两个多钟头，出了南门外，到了十里铺。这是延安和外界交通的一个联络站，有一名八路军的李副官和一名护理兵，已经在那里等着我。林山同志把秘密文件亲自缝在我上衣口袋里。我们共同用了午餐后，大家告别，我托他向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们，以及边区文协同志们问好。

第二天早上，李副官、护理兵和陈世富等三人，扶我登上停在门口的卡车，汪伦和塞曼尼夫妇二人也不约而同地来了，他们也是到重庆去的，他们就结伴而行。当时有许多陕北公学的同学们都爬上车来，他们都是离开延安，到全国各地去的。其中有一位叫做滕翔，我们攀谈起来，知道她的目的地也是重庆。她还是爱读我的作品的读者。

大卡车出动了，沿着黄土高原，一路上浩浩荡荡前进，所到之处传出救亡歌曲的声音，同学们的笑声，谈话声，汇成有节奏的交响乐。

别了延安！别了宝塔山！这是1939年4月12日的事。

~~~~~

## ※来 函 照 登※

人民日报编辑部：你报今年4月29日第五版发表的我写《忆彭总二三事》一文，抗大五周年校庆时，地点有误。据了解，时间应为1941年5月，不是下半年；地点在邢台浆水村，不是将军墓。请更正。

戎子和







